

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依据及路径探析

——基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研究

张诚

(厦门大学 福建厦门 361000)

【摘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内容包括：人与自然是一体共存关系、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是反生态反人类的、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体。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是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依据，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范式参照和路径指导。我们要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基本内涵和科学构想，在自然、社会以及人这三重维度探索美丽中国建设的新方向。

【关键词】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美丽中国

自然是人类依存的家园，一切人类活动都依赖于自然界的协调有序运转，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福祉。立足时代背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美好生态目标。在新时期怎样开展生态文明建设，如何实现美丽中国的美好图景，需要我们在理论上回归源头，探究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为美丽中国建设找到科学理论指导。

一、美丽中国建设的理论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

生态问题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研究中关注的重点领域，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19世纪，生态的恶化还没有凸显为全球性的公害问题，也不曾像今天这样牵动和影响整个人类的前途和命运。但这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没有生态思想，在他们的很多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都蕴含着丰富的具有前瞻性的生态思想，如奥康纳所言：“当今世界经济的主要轮廓几乎可以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所凸显出来的理论视域中被解读出来。”^[1]马克思恩格斯预见到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未来人类社会面临两个重大难题，他们从论证人与自然的一体共存关系以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反生态反人类本质两个方面入手，阐述了他们对生态问题的独特见解，并在此基础上展望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将如何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同体。两位导师对生态问题的透彻分析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心系人类命运、观照现实问题的理论光芒。梳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理论内涵，不仅是继承和创新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任务，更是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现实要求。

（一）自然界具有先在性，人与自然一体共存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核心内容。马克思认为，自然优先于人类出现和发展，意味着自然具有先在价值和优先地位，人类在自身发展中

应尊重顺应自然。马克思从“历时态”“共时态”“未来时态”三角度论述自然界的先在性。从历时态看，自然优先于人类而出现，人类是自然之子，自然界孕育和造就了人和人类社会。“人直接地是自然的存在物。”^[2]“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3]从共时态看，自然界始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从自然界中获取所需的一切生产生存资料，人类的生产和发展离不开自然界的供养。“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4]“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5]从未来时态看，不论人类社会在以后发展到什么程度、进化到多高的水平，都摆脱不了外部环境的条件限制。整个人类社会都必须加入自然环境中，并遵守自然系统的演化和作用规律，“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于自然界”^[6]。

在承认自然界先在性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认识到人与自然之间是能动性和受动性相统一的共存关系。人在自然界中以主体身份存在和发展，人是具有能动性的自然存在物，人“积极地活动，通过活动来取得一定的外界物，从而满足自己的需要”。^[7]人的这种相对外部自然界的主体性，使人超越其他自然存在物，并且具有其他生命形式所无法相比的主观能动性；而人的主体能动性与自然界的客观性之间并非是对立排斥的，人也是“受动的存在物”。在自然界中，人不能随心所欲、胡作非为。“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8]人的实践活动是人的主体性和客体性、能动性和受动性有机统一的基础。人通过实践活动将自身的能动性展现出来，同时对自然界施加影响，自然界被打上了人的烙印，呈现出客体被主体同化的过程，逐渐成为“人化”的自然；而人的主体实践活动也必须遵循自然界外在的客观规律，并且要在实践检验的基础上，不断更新自身的认知，调整自身行为，以便更有效地指

导下一步实践活动，这是主体不断客体化的表现。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主体客体双向共进的演变过程，其演化的程度越深刻，人与自然之间就越紧密地融为一个整体。

（二）资本主义制度本质上反生态反人类

19世纪的西方社会，当人们普遍还沉醉于工业化所带来的富饶财富，并惊叹于社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时，马克思恩格斯就已预见到隐藏于资本主义社会深层的种种隐形矛盾。在自然领域中，自然环境在大规模人类活动的作用下变得面目全非、满目疮痍，生态问题不断涌现并逐渐恶化，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冲突开始走向明面；在人类社会，人与人的关系也不断恶化，社会贫富分化越来越明显。随着机器大工业生产的蓬勃开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空前提高，社会财富呈现出爆发式的增长态势，而作为社会财富创造者的工人阶级，却没有分享到生产力发展所应带来的丰厚物质回报，反而是工人自身越来越贫困，地位越来越低贱，生存越来越困难；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到了现实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种种不合理的现象，以生态文明的全新视野，深刻揭示了造成这一系列社会问题的阶级和社会根源。

阶级根源上，马克思认为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他们依靠盘剥工人的剩余价值而生存，他们想尽一切方法去获得剩余价值并加大对工人剩余劳动的剥削。在逐利本性的驱动下资本家们不断压迫工人，并持续扩大再生产，而这些生产出的经济成果几乎全部被资本家据为己有，留给工人的只有可怜的仅供维持生计的微薄工资。

“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9]“资本是不管劳动力的寿命长短的。它唯一关心的是在一个工作日内最大限度地使用劳动力。它靠缩短劳动力的寿命来达到这一目的，正像贪得无厌的农场主靠掠夺土地肥力来提高收获量一样。”^[10]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详尽描述了19世纪伦敦地区工人阶级的悲惨生存境遇和贫困生活面貌，“每一个大城市都有一个或几个挤满了工人阶级的贫民窟……街道是肮脏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垃圾，没有排水沟，也没有污水池，有的只是臭气熏天的死水洼”^[11]。这些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是造成工人们生活贫困、健康受损等一系列个人问题的罪魁祸首，暴露了资本家对工人阶级基本人权的践踏和对环境的污染。

社会根源上，资本主义社会本质上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畸形社会。资本成为当时社会的主宰，人变为了资本的附属品，降为次要的存在。资本所关心的“物”也只是最近最直接的物质生产成果，而那些与现阶段生产无关，而只会在以后才逐渐显现出来的，由于矛盾不断积累所产生的隐形危害，如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所引发的联动效应，被完全忽视了。“资本主义生产……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自然条件”^[12]，这导致了“地力损耗——如在美国；森林消失——如在英国和法国”^[13]等诸多生态灾害。正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利润化的发展模式，环境问题才会愈演愈烈，直至无法收场，并最终会摧毁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发展根基。马克思恩格

斯在相关著作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丑恶现状的揭露明确表明了他们对私有制生产方式的人道主义批判，他们认为要改变这一现状“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4]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要将全人类从资本主义魔爪中解放出来、摆脱生态不断恶化现状，必须对具有反生态和反人类本性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彻底的变革。

（三）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展望

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资本主义制度贪婪本性及其私有制的生产方式对自然造成无法挽救的破坏的同时，合逻辑地指出了人类社会摆脱生态困境、走向美好未来的方式途径。“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14]马克思认为只有更替资本主义制度，克服私有制生产方式，才能够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制度必然导致的生态危机。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使用“联合”方式消灭以剥削和异化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建立公有制的理想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15]。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人类劳动将完全摆脱资本主义制度所强加的异化状态，成为人的自由自觉行为。这种社会中联合起来的生产者能够调节控制人与自然间的物质变换，从而达到对自然最合理、最正确的利用，开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新时代。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理想，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命运归宿。在自然领域，人不再浪费和破坏自然资源，人与自然将结成“真正的共同体”。在社会领域，人剥削人的现象彻底消失，异化劳动被合理扬弃。人成为“社会化的人”，是“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不再使自然作为盲目力量统治压迫自己，人和自然、人和人之间的矛盾得到真正解决，互相之间形成命运相连、互融共生的“共同体”。

二、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对美丽中国建设的意义

自十八大首次提出“美丽中国”的概念以来，“美丽中国”逐渐从一个由政府倡导的官方术语向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扩展开来。无论就公众生态意识的觉醒，还是学界日趋系统的相关理论研究，抑或是政府的政策导向和宏观制度建构而言，可以说社会各界均对生态问题给予高度重视。2017年党的十九大进一步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时代目标，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领导集体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瞻远瞩和深谋远虑。美丽中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是我们党自觉以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为指导，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不断反思和探索的结果，标志着党在治国理政方略上实现了一次全方位历史性的深层变革。在当前，从学理上探析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分析其对美丽中国建设的现实意义，对做好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

（一）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

人是自然的产物，是在自然界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

的；人也是实践活动的主体，是具有能动性的存在物。为了维系自身的生存和繁衍，人类必然要向自然界获取所需的物质资料。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利用，在满足了人主体需求的同时，确认了自然的存在价值和使用意义，也因此开启了人类文明史。从人类历史发展来看，人类与自然界命运相关、共生共荣，对自然的保护就是保护人类自身。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解密，指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自身与外部环境的关系，对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思想引导作用。如今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各项事业的发展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加以引导，在总结过去发展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上正式提出了“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6]，这一科学论断充分肯定了自然界的客观价值和优先地位，主张人和自然之间的和平共处。“生命共同体”理念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在本根上具有一致性，均主张在尊重和善待自然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共生共荣，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共存发展作为价值归宿，将人的前途与自然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新时代所强调的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当代继承和与时俱进，体现了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回归和发展。

（二）为美丽中国学术研究提供了范式参照

“范式”是指一学科所遵照和参考的理论规范，是学术研究者在进行理论研究所参照的研究模式，科学的范式可以为学术研究提供正确的价值引导。对于如何看待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西方曾出现诸多的范式学说，代表性的是以林奈为首的“人类中心主义”以及梭罗等的“生态中心主义”。前者认为人是自然的主人，自然界不过是人们实现自身利益的手段和工具，人具有高于其他客体的优先地位和支配资源的主宰权。后者则强调自然界的优先地位，反对人类对自然所施加的任何利用和改造行为，贬低甚至否定人的主观能动性，将对自然的维护推向了极端。两种学说都只看到了人或自然的存在价值和意义，完全忽视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只强调各自的主体性却否认了客体性，将人和自然看作绝对对立的互斥存在物，陷入了非此即彼的错误思维方式。这些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论”看似“殊途”实则“同归”，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生态问题，只会不断加剧现实中人与自然的冲突。

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形形色色的“中心主义论”的合理观点，克服了自笛卡尔以来西方盛行的自然与人二元切割的思维方式。他们创新性地将唯物主义与生态文明联系起来，强调自然环境与人类文明的双向互动与和谐统一，建立了“以人为本”的生态研究新范式。马克思恩格斯基于唯物主义立场一方面科学地论述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认为自然是人类生产和发展不可缺少的对象；另一方面承认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的客观规律，重视和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人自身的生存需要，主张在满足人类合理需求的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的可持续发展；他们通过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演变历史的考察，分析了人与自然如何从和谐走向对立的现实状况，并预见地指出

人与自然最终将走向共产主义美好社会的必然性。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始终以人与自然的整体利益为参照，是唯一可以正确解决人与自然矛盾的科学理论，这也为学界在美丽中国的理论研究中提供科学的借鉴范式。

（三）为美丽中国实践提供了路径指导

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揭示了人与自然本质上的一体共存关系，但这种理想的双向度关系，在现实中却由于人对自然不合理的改造，而逐渐沦为自然对人的单向度供养。自工业文明诞生以来，特别是人类社会进入现代化进程后，人类一改过去受自然压迫和拘束的被动状态，逐渐走上了一条主动的征服超越道路。在日趋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的推动与鼓舞下，人类把支配自然的理念发挥到了极致，一方面向大自然不断地索取各种物质资源，另一方面却把废弃物不加处理地全部排放给自然界，由此导致了日益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目前，世界正面临着全局性的气候变暖、生物种类锐减、土地肥力下降等频发的自然灾害，生态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重要隐患。

在生态文明的实践路径方面，马克思曾提出“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7]构想。这种实现低投入、高产出的集约发展理念是建设美丽中国的科学原则。党的十九大报告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思想，明确提出“推进资源全面节约和循环利用”^[8]的时代新主张，体现了对马克思物质变换理念的继承和创新。目前我国社会正经历从近代工业文明向现代生态文明的转向进程中，要想实现美丽中国文明形态的转型升级，实现社会面貌的全方面转变，要求我们在实践活动中遵循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合理调节人与自然的物质变换。

三、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对美丽中国建设的路径启示

马克思恩格斯的构想中，人、自然、社会三者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统一整体。美丽中国建设也应是建立在自然美好、社会进步、人的发展三者有机统一的基础上。自然环境是人与社会发展的物质根源和现实依托，没有自然提供的环境空间和外部资源，人与社会的持续发展无从谈起。社会的文明进步是自然价值的现实显现，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则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最高理想指向。

自然维度上，建设“自然美”，恢复自然生态平衡，打造更多的优美自然景观。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启示我们要重视自然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意义和作用，只有实现了“自然美”，中国才会“美”。美丽中国建设要在恢复自然生态平衡的基础上，打造现实的自然美景，如青山绿水、蓝天白云、花团锦簇、莺歌燕语等自然风貌，或是阡陌纵横、良田美池、鱼翔浅底的田园风光等等，这些美好景致是美丽中国蓝图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生动的展现形式，是美丽中国之“自然美”真正形成的标志。建设清洁美丽的自然环境，使人类在大自然中惬意舒适地生活，自然也在人类的保护下永续发展并为人类生存提供资料，实现人与自然的永久和谐。（下转第52页）

尽管社会工作专业认可度的提升,并非由某单一因素决定。但在农村偏远地区开展社会工作服务,更多考验的是社会工作者的实际问题解决能力和适应能力。在这些地区,服务对象及其家庭所面临的问题大多与经济有关,更多体现的是由于贫困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因此,农村社会工作服务是否得到服务对象认可,是否获得当地政府部门的认同,与提供直接服务的一线工作者对现实问题的解决程度和解决效果有着密切关系。基于此,农村社会工作服务对一线社会工作者的资源链接能力、问题解决能力、沟通交流能力等综合能力有较高要求。社工既要具备较强的资源链接能力,充分链接社会资源,同时又要具备一定的扶贫能力,能够帮助服务对象家庭制定生计发展计划,提升其自助能力,最终走出困境。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广西中青年骨干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粤桂两地政府购买居家养老服务主体间合作机制比较研究”(2017KY0233)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民政部.民政部关于开展未成年人社会保护试点工作的通知[EB/OL].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zwgk/2013-05/14/content_2401998.htm,2013-05-14.

作者简介:黄春梅(1978-),女,壮族,广西百色人,桂林理工大学讲师,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府购买服务与社会治理、养老问题。

责任编辑 / 陆一霖

(上接第20页)

社会维度上,形成“社会美”,建立生态化的社会体系、社会结构以及社会观念。社会要素是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的重要维度,社会是人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是人与自然之间必不可少的连接纽带。马克思恩格斯深入分析阐述了资本主义私有制对工人的身心伤害和对自然环境的污染破坏,认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使人与自然摆脱被资本奴役和污染的悲惨命运。这一构想启示我们,在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要注重加强社会层面的制度建设,发挥社会主义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制度优越性。对此,一方面要推动建立资源节约型、生态安全型、灾害防控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美丽社会。另一方面要形成生态化的产业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为美丽中国建设提供强有力的社会结构保障;除此之外,还要在全社会培育树立生态社会观。理论只有被人民大众真心理解和普遍认同,人们才会在生产生活中自觉地加以遵循,在实践中处理好现实复杂问题。在当前,培育正确的生态观念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要努力在社会范围内培育和树立科学的生态理念。

人的维度上,实现“人美”,关注人民对优美生态的诉求,满足人的美好生活需要。马克思恩格斯深刻揭露和抨击了资本主义制度对人的本质的扭曲和异化:工人被资本家当作生产的工具手段,人被扭曲为物的片面的存在,百姓生活在极度贫困的痛苦境地中。新时代美丽中国的建设必须克服资本主义见“物”不见“人”的发展陷阱,充分考虑和不断满足人民的正当合理需求,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获得感,促进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19],十九大提出的这一重大论断精准阐明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现实需求。现阶段而言,人民群众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有着更高层次的追求,而且对优美环境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干净水源、优质空气、美丽环境已经成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要求和期盼。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主要社会矛盾的主要表

现,这决定了今后一段时期我们必须正视和参照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情况,提升生态环境的发展质量和美丽中国的建设水平,始终关注并不断满足人民在生态环境领域的美好生活需要,在美丽中国的建设进程中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参考文献:

[1]奥康纳.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4.

[2][4][8][11][1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09,161,209,167.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75.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8,550.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70.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405.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521.

[1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75.

[12][1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27.

[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85.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28.

[16][18][19]习近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50,51,11.

作者简介:张诚(1994-),男,辽宁连山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责任编辑 / 周洁